

论郑杭生关于社会学研究的 理论自觉与文化禀赋

李娜,胡翼鹏

[摘要] 郑杭生以社会运行论为主干的社会学研究体系,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理论自觉,而且具备深厚的历史感和文化禀赋。该研究体系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两大社会学传统的批判继承,也是对中国治乱盛衰的历史变迁和以治乱盛衰为关照重心的思想传统的借鉴融会。正是由于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独特的文化禀赋,郑杭生的社会学研究体现了科学性与人文性的高度统一,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而不是某种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中国版。

[关键词] 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理论自觉;文化禀赋

[作者简介] 李娜,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胡翼鹏,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图分类号] C9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13)08-0186-08

郑杭生先生从事社会学研究已经30余年了,他不仅注重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而且更注重对经验研究的理论提升。由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和学科本土论,以及与这“五论”密切相关的其他理论命题,共同构成了郑杭生关于社会学研究的逻辑体系。以社会运行论为主干的“五论”及其衍生命题,既是郑杭生本人社会学思想的集中表达,也是以郑杭生为灵魂的“社会运行学派”的学术皈依,不仅蕴涵着独特的文化禀赋,也体现出了高度的理论自觉。

近年来,有关郑杭生的社会学思想的研究讨论已有不少成果,对郑杭生提倡的社会学理论自觉也进行了一些总结分析^①。不过,这些总结分析大多侧重于重申理论自觉的内涵和价值,而对其

社会学研究达成理论自觉这一学术目标的表现和因素探讨不多。实际上,郑杭生的社会学研究之所以能够达成理论自觉,根本因素是其研究所蕴含的文化禀赋。理论自觉与文化禀赋相辅相成,理论自觉锻造了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的学理自性,而文化禀赋则奠定了其学理自性的核心价值。

—

在费孝通“文化自觉”论的影响启发下,郑杭生于近年来提出并大力倡导社会学的“理论自觉”^②。理论自觉不仅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前景提供了明确的目标方向,而且也正是郑杭生本人的社会学学术进程的真实写照。理论自觉作为中国社会学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学的中国化进程研究”阶段性成果(10CSH001)

① 陆益龙:《从文化自觉到理论自觉——郑杭生对中国社会学及理论的贡献》, 吴平清:《“理论自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郑杭生的社会学理论立场及意义》, 董翔薇、董驹翔:《理论自觉与中国社会学学派的成长——郑杭生的社会运行学派及其贡献》,以上三篇文章同载《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吴平清:《“理论自觉”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以郑杭生及其社会运行学派为例》,《西北师大学报》2012年第3期。

② 郑杭生:《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郑杭生:《“理论自觉”与中国风格社会学——以中国社会学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的一种学术取向,其“自觉”的核心与前提是创造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郑杭生就带领他的学术团队先后提出并论证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等理论与命题。

其一,社会运行论。社会是一个由不同要素和子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在理想状态下,各个社会子系统和不同社会要素在发挥各自的功能的同时,彼此之间交互影响且协调互补,从而使社会在动态发展中保持平衡与秩序。社会运行存在良性运行、中性运行、恶性运行三种类型,或者协调发展、模糊发展、畸形发展三种状态。特定的社会运行状态是由具体的条件和机制决定的。社会运行的条件包括人口条件、环境资源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和社会心理条件等,而社会运行的机制则包括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和保障机制等。

社会有机体的运行状况是通过微观层面的社会子系统、社会要素的能动状态及相互关系体现出来的,因而社会运行论解析社会子系统、社会要素各自的功能发挥与综合的功能协调,其终极目的在于考量社会有机体的运行和发展状况。所以社会学的使命是科学地探索研究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从而使社会尽可能地处于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之中。也就是在宏观层面上理顺一些重大的、基本的社会关系;在微观层面上理顺社会的个体结构,在日常生活中实现良好的人际互动模式^[1]。

其二,社会转型论。当代中国社会的运行状况,从总体上而言处于中性运行、模糊发展并逐步向良性运行、协调发展迈进的状态中。这种运行态势表明中国社会正处于一种深刻的转变之中,这种转变不仅仅是社会运行状态由曾经的恶性运行向中性、甚至良性运行转化,而且也表现为社会运行性质的转换,即中国社会正在由传统向现代、更新现代的转型。因此,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2](P202-203)}。

研究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转型,都必须从“转型度”与“转型势”两个维度来把握,离开这两个方面,任何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都无以立足^[3]。社会转型度是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程度与特点的说明和衡量,反映社会转型的整体状况,包括速度、

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等五个方面。而社会转型势则是对社会转型度更进一步的深化,特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或社区转型的能力、态势及其发展趋势的不平衡性。根据转型能力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当前中国社会可以划分为优势级、中势级、弱势级三种不同的转型地区。

其三,社会互构论。个人和社会是人类生活共同体最基本的两大行动主体:个人是社会的终极单元,社会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个人与社会之间是一种互构共变关系:所谓互构,是指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相互建构与型塑的关系;所谓共变,是指社会关系主体在互构过程中的对应性变化状态。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发展就是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共变的演化过程^[4]。在这一过程中既存在着对立冲突,也包含着协调整合。由此,需要建立一种能够将个人与社会关系处理得当的新型现代性,促使互构过程中的对立冲突转变为协调整合,促进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经历着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变,而且经历着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变。在社会转型快速推进过程中,现代性的转换导致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而互构共变是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即社会在型塑个人,同时个人也在建构社会。因而,在具有“自上而下”改革压力与“自下而上”变革要求双重动力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进程中,既要考虑作为社会的国家、集体对个人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个体对于集体、国家等社会存在的影响^[5]。

其四,实践结构论。无论是世界范围还是中国社会,社会实践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而且这一变化是结构性的巨变:一方面,这种变化具有普遍性,直接或间接影响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实践行动;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不是局限于某一层面,而是波及各个领域,具有通同共生、连锁反应的特点。造成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根源,是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变化,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的共同作用。那些左右社会生活的重要变化,那些影响个人生活的复杂症候,都是这两股力量相互作用造成的一系列后果^[6]。

在当代中国,改革不断推进社会的急剧转型,社会实践也经历了急剧变迁,目前已走进了一个新的转折期。这个既取得前所未有社会进步又付出沉重社会代价的过程,使我们能够从经验上更

直接地体验到“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及其两个维度”^[7]。因此,实践结构论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不仅揭示了世界现代性进程中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模式,也提供了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运行与转型的“双侧视角”:一是在历史长时段中揭示现代性的总体趋势及其逻辑,一是在本土社会转型的具体视域中透视快速演进、交替进行的社会变动。

其五,学科本土论。社会学是在西方社会,特别是欧美文化中生成壮大的知识体系,因此相对于非欧美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西方社会学一直处于强势输出地位,而非欧美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学则长期处于从属追随地位。然而,从国外移植引进的社会学,并不一定与“进口”地区的社会文化完全匹配,所以“进口”地区舶来社会学之后大多存在一个本土化的问题。社会学本土化就是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8]。

社会学本土化是社会学学科发展的世界性特征,社会学中国化就是社会学本土化在中国的体现。社会学中国化的根本目标在于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形成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并使之能够和国际上的强势社会学平等对话,并最终成为世界范围内社会学的有机构成部分。为此,中国社会学应当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走“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相结合的道路。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即是与国外社会学交流对话,以及对国外社会学借鉴回应基础上“新”生的中国化社会学理论。

上述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和学科本土论,有的已经比较成熟完善,有的仍处于需要进一步提炼升华的阶段,如实践结构论。另外,上述“五论”只是郑杭生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思想的主体骨骼,除此之外,郑杭生近年来还进行了多项极具现实感的研究探索,如有关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探索、中国经验与中国模式的分析、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倡导等,它们既是对以往“五论”的具体展开,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的深入,又成长为新的理论发生点。

二

正如郑杭生本人的总结,社会运行论、社会转

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和学科本土论等“五论”及其衍生命题,是“理论自觉”的一个个轨迹点、支撑点,都是立足中国社会的现实变迁,开发传统学术资源,并借鉴国外社会学理论前沿,反思自己、审视别人,进而提炼自己特色的结果^{[9](P 序 3)}。因而,理论自觉是一条贯串“五论”及其衍生命题的“自觉”线索,为我们解析郑杭生社会学的本真内涵提供了恰当的方法论视角。

历史地来看,中国社会学的移植性格,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其实用、应用品格,所以1949年之前的社会学研究普遍重视问题分析和经验调查而忽视理论提炼概括。1979年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这种品格仍旧在相当程度上被沿袭或延续,经验调查和问题分析被置于首位而理论建设被有意无意忽略。郑杭生深刻洞悉这种碎片化研究的弊病,因而积极倡导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并身体力行进行问题和经验的理论抽象与提炼。这种努力既结出了丰硕成果,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肯定,他和他的学术团队被称为社会运行学派,其理论探索被誉为“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由中国社会学家自觉提出来的最早的一个系统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10]。那么,以上“五论”及其衍生命题何以被看作一个系统化的体系?

其实,谢立中在此前就指出,社会运行诸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大体为:学科本土论为社会运行学派提供了目标和方法论方面的前提,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构成了社会运行学派的理论主体,社会互构论则是对这一理论主体的进一步深化^[11]。李迎生也认为,诸论是有着比较严密的内在逻辑的统一整体,只有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探求彼此之间的逻辑与关联,才能理解其深刻内涵。他的看法是:学科本土论为该理论体系提供了学理基础,社会运行论是该理论体系的核心,社会转型论是该理论体系的拓展,社会互构论是该理论体系的深化^[12]。而郑杭生本人的说法是:社会运行论是基础,社会转型论是深化,学科本土论是追求和方法论,社会互构论则是各论的进一步升华^[13],实践结构论又是在上述“四论”基础上进行的新探索^[7]。当然,这一说法是从思考轨迹与研究推进的时序方面给出的先后排列关系,而不必是指理论统一体自身的内在逻辑关系。

从整体上来看,“五论”并不是当其中某一个理论完全成熟定型之后,才提出下一个新的理论命题,而常常是在阐述论证前一个理论命题的过程中,就已经从新的角度对与之关联的新论题作

出阐发说明,进而形成另一个新的理论;另一方面,在提出并论证新的理论命题过程中,对于之前的理论也不是束之高阁,而是仍旧适时地作出补充深化,使之更趋成熟完善。因此,“五论”在时序上的关系,只是其提出、论证在时间表上的位置排列,并不等于彼此之间在内在理路上的逻辑关系。也即是说,尽管“五论”是在不同时间先后提出并分别论证建构的,在时间上表现出一种次序性,然而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却并非与其生成时序严格吻合。这表明郑杭生的社会学思想和社会学理论并非范畴与命题的多样自由组合,而是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理路和思维主线。

结合学界同仁的相关看法,以一个简单模型来比拟“五论”的逻辑关系:社会运行论是主体、是核心,从宏观层面上确定了社会转型、社会互构、实践的结构巨变等理论命题的内容与取向;而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以及其他理论命题则是分支别干,从不同问题、不同视角阐释中国社会的运行,同时也是社会学本土化的具体展开;而学科本土论则是这个模型的说明手册或操作指南,超越社会学的具体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成为对具体社会学理论的社会学阐释。

因此,“五论”不是平行的、并列的关系,而是在内在的逻辑理路上有着主从之分,其间的主从关系是由它们各自在其共同组成的理论统一体中的角色位置决定的。诚如杨敏教授所言,若论开源拓荒,奠定基业,启育后人,融聚新论,诸论之中功德卓著者,非“运行论”莫属。这也应当是以“社会运行”标识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形成的理论流派的本质所在。社会运行论在诸论中的核心位置,源于它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高屋建瓴地规划与阐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历经古典、现代直至当代,一直未能从根本上得到科学界定。如果中国社会学要在社会学世界格局中博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对这一问题给予富有创意的、合乎理据的回答。郑杭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视为社会学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之所在,视为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建构起点^[14]。

郑杭生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主张,源于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留学英国期间的学习和思考。回国之后,郑杭生正式提出自己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15]。这一定义已经得到了社会学界的广泛认同与接受,而且

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关键点——社会运行一词也早已成为了日常流行语汇。据郑杭生本人对形成这一观点的思想历程的回顾,社会运行论一方面是对国外社会学两大传统——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的借鉴和吸取,另一方面是对传统中国治乱盛衰的历史变迁的开发和以治乱盛衰为思考重心的学术传统的继承。促使郑杭生关注中国治乱盛衰的历史变迁,除了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的影响,也与他自己的人生阅历和切身感受息息相关。

郑杭生发现,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的30年间,初步良性运行加上中性运行只有17年左右,而局部恶性运行和全面恶性运行却占了13年左右。这一状况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并非自然而然地良性运行,而是在一定条件和机制下可能陷入恶性运行。而当整个社会陷入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面恶性运行时,不仅整个社会停滞倒退,而且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会受到伤害。同时,通过研究中国历史变迁,郑杭生也发现,传统中国既有许多著名的“治世”,也有不少典型的“乱世”。而当世运离乱或处于恶性运行状态时,也就意味着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经济与文化遭到巨大破坏。因此,社会运行问题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安危兴衰,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前途和根本利益^[16]。关怀家国族群命运,探寻社会发展方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而求治去乱或者说使社会避免恶性运行的思考与努力,也是古今志士仁人的抱负理想。正是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把握,以及对古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精神的承继,郑杭生在他的社会学研究过程中自觉地将去乱趋治、实现良性运行作为根本追求。

另外,郑杭生提出社会运行论也是与严复的影响分不开的。百余年前,严复翻译斯宾塞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时,把“SOCIOLOGY”译为“群学”,把书名译作《群学肄言》。显然如此翻译并未忠实于原文,而是有意穿插了太多附会、诠释和投射,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严复的中国传统观念渊源深厚^[17]。严复在《群学肄言》的译序中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18]即社会学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治和乱、盛和衰的原因,探寻使社会达到治康的方法和规律的学问。正是受到严复的启发,郑杭生沿着严复的思路,结合对中国成立以来社会运行状况的反思,形成了社会运

行三种类型——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中性运行与模糊发展、恶性运行与畸形发展的观点。尽管运行“三分法”有别于严复的治乱“二分法”，但在精神内涵上却延续了中国社会学发端之初的人文性。

因此，社会运行论融会经典社会学范畴与命题，以及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求治去乱的理念与实践，既从结构功能的角度阐明了社会秩序的动态生成机制，也从中国历史变迁与传统思想中揭示了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逻辑。由此可以这样认为，对国外社会学两大传统的借鉴和吸纳，保证了社会运行论之社会学的学理品格，而对中国治乱盛衰之历史变迁的开发和以治乱盛衰为思考重心之学术传统的继承，则使社会运行论蕴含了独特的文化禀赋。

三

社会运行论不仅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的理论精髓，而且从一开始就根植历史变迁和时代主题，熔铸传统思想和先贤智慧，彰显出深厚的中国文化禀赋。这一文化禀赋，既与费孝通之拓展社会学研究视野的倡导遥相呼应，也与我国当前之社会文化建设的主旋律相得益彰。

文化禀赋是指在某一社会文化环境中生成的社会学理论命题所获得的思想内核和精神特质，并由此表现出异于一般理论的鲜明文化特征。社会运行论被视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特色”得以彰显的重要根源即是其“中国”的文化禀赋。社会运行论之所以是“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并非因为资料对象或研讨问题属于中国社会，也不是由于创建者为中国人的缘故，而是因为其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必要的元素和成分，中国文化给予了社会运行论特定的内涵、特征和表现等。由此，社会运行论的文化禀赋是隐含在其话语、逻辑之中的中国元素，这些元素不是可以被分离出来的知识点，而是与其宗旨、议题融为一体的思想内核和精神特质。社会运行论的文化禀赋彰显了其不同于国外社会学理论之内涵特征的异质性，而这一区别于国外社会学理论的异质性正是其中国特色之所在。

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知识门类，社会学围绕大体一致的论题，使用基本相同的概念，是在一种通则性的、普适性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展开言说。不过，所谓的通则性、普适性是从理想

状态就其使用的范围和程度而言的，实际上在“普”和“通”的背后，有着深深的西方文化烙印，而与中国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隔膜。在世界范围内，属于同一个学科群的学者们虽然使用着相同的术语和概念，但是同一概念或术语的内涵却常常因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差异甚大。导致这一后果的直接原因，固然是那些擅长现学现用的学者不求甚解望文生义而造成谬种流传，其实也表明某些理论或概念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其恰切的内涵所指总是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

社会学是现代西方文化背景中生成的知识体系，是一种舶来的异域文化知识，故而才有本土化、中国化的诉求。当然，除了社会学的中国化、本土化诉求之外，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等学科和领域同样有中国化、本土化的要求。当前，有关“中国化”的讨论和研究可以说已经汗牛充栋、浩若烟海，涉及中国化的理论可能、实践途径和衡量标准等方方面面，其中中国化的实践途径尤其受到格外关注。就社会学的中国化途径来说，关注本土文化元素并将其纳入社会学的研究视野，成为海内外学者们探索社会学中国化的共识和共同选择，如美国的林南等，港台的金耀基、叶启政、萧新煌等，大陆的费孝通、郑杭生等，他们毫不例外地将中国化的目光转向了传统思想文化资源。

传统源于过去，是“活着的过去”，是能够“活到”现在的那一部分过去^[9]。不可否认，随着现代化、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社会开始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现代西方的特征。然而，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赓续传承、绵延不绝，在现代化、全球化高歌猛进的当下，仍旧坚韧顽强地影响着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也就是说，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社会虽然在西风激荡之中发生了剧烈变化，可是在变化之中仍有坚持和坚守，特别是深入文化基因的价值观念，在千变万化的形式之下，仍旧保留了一如既往的内核。由此，回溯历史、关照过去，能够使我们透视现代性的迷幻表象而获得一种自知之明。

也正是如此，“开发传统”是郑杭生社会学的基本原则和重要理念，因为只有深入研究传统思想文化，找到中国社会文化的根柢与特质，才能保证社会学在服务社会需要中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如上文所示，基于严复的启发影响以及自身的人生经历，郑杭生开发传统的视界主要聚焦于中国社会治乱盛衰的历史轨迹和历代学者以治乱盛衰为思考重心的思想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建构

起了社会运行论的基本体系。社会运行论与孔德和马克思两大社会学传统的根本宗旨一脉相通,同时也包含着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治乱盛衰和历代思想家“求治去乱”的思考与实践的凝练概括。尤其是“去乱求治”作为善治理念,与社会秩序与进步、社会良性运行的终极关怀是一致的。社会运行论既然是从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变迁实际中来的,当然也能够回到历史实际中去,对治乱盛衰的历史轨迹及其思想传统作出清晰透彻的理解诠释。相应地,“去乱求治”思想传统中的某些元素既可以作为有效分析认识当代社会的有益成分,同时可以“反哺”社会运行的理论思考,给予社会运行论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开发传统”有多种方式和多种视角,郑杭生关于社会学开发传统的方式主要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郑杭生指出,只有加强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和民族性融入社会学中,才能使社会学在中国生根发展,才能创造出与中国国情和社会文化相吻合的社会学。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是郑杭生社会学的文化禀赋的一个重要渊源。在郑杭生看来,通过科学地反思传统中国社会关于社会运行条件和机制等的思想与文化,继承和弘扬历代优秀的社会思想,有利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妥善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真正使社会学服务于中国社会及中国社会大众^{[20](P3)}。因此,郑杭生不仅在他的经验研究与理论建构中时刻贯穿着社会思想的有益元素,而且切实完成了一大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著述。

早在1995-1996年,郑杭生曾组织学术团队搜集资料,为进一步开展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作准备。资料选编以社会运行论为指导原则,分为七个专题:社会变迁的轨迹——治乱盛衰;治世的社会条件及运行机制;达到治世的途径与手段;治世的理想模式;乱世的社会根源;乱世的治理与控制;乱世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和危害。以此为基础,郑杭生与其他合作者一道,发表了多篇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大都收录在四卷本的《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中,成为“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2010年出版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1世纪社会学研究生系列教材”的主打著作,标志着郑杭生及其学术群体运用社会运行论进行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

《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以社会运行理论作为

诠释框架,从历代学者考量社会问题、规划社会理想的具体话语情境——治乱盛衰——入手,开拓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这种新视野应用社会运行理论的知识系统与理论范式,综合考量某个社会精英或学术流派的思想学说和行动主张,逻辑呈现他们如何以社会运行与社会秩序为中心,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回应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展开去乱求治的理性思考和实践。

郑杭生及其学术群体运用社会运行论进行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取得的良好效果,说明社会运行论不仅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变迁,是从历史中来的,而且能够回到历史中去,熔铸历代思想家关于治乱盛衰的思考探索,使社会运行论与传统社会思想互构共契,进而达成同一关系。从历史中来,又回到历史中去,从而使其以社会运行理论获得了深厚的文化禀赋,表现出鲜明的中国色彩。

四

社会运行论根植于传统中国治乱盛衰的历史变迁脉络,并熔铸历代仁人志士探索去乱趋治的传统社会思想,同时坚持社会学的基本精神和深层理念。毫无疑问,这一品格使社会运行论既具备社会学的一般性质,又涵蕴中国文化的特殊禀赋。而与社会运行论有着密切逻辑关联的其他具体理论,如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以及对以上诸论作出社会学阐释的学科本土论,也都具备来自传统的文化禀赋。

传统和现代两者之间除了有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一面,还有相互依存、相互吸收的一面,……社会转型论就是一种主张传统和现代既对立又统一的新型的现代化理论^{[2](P205-206)}。正是基于这一判断,郑杭生坚持认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本质,是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郑杭生之所以强调这一转型观,不仅源于他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理论洞悉,也源于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当下的中国社会不是一个全新的社会,而是包含着诸多传统因素的社会,仍旧处于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过程之中。也正是因为对中国社会文化赓续不绝的延伸性具有深刻理解,郑杭生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主张构想、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的总结规划,无不立足于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这一基本社会事实,不仅特别强调传统对当代社会进程的深刻影响,并且注意从传统思想文化中汲取有益元素,从而使社会转型论及其深化

命题具备了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文化禀赋。

社会互构论对当代个人与社会关系动态演进的阐述和诠释,也包含着来自传统社会思想和历史文化的启迪与影响,因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核心^{[20](P26)}。社会互构论的另一主要阐释者杨敏教授指出,社会互构论实质上是以社会学理论的方式,对中华文明的“柔性融和”与“和谐大同”等传统脉络的延伸。“柔性融和”是社会互构的一种表达机制,这一过程使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重新组织起一个共生空间,这些多元文化的核心结构如价值、理念、信仰等,要素结构如符号、象征、意义、仪式等,规范结构如习性、风俗、禁忌、戒律等,在此发生交叉、重叠、复合,在相互调适、修正和改造中发生协同性的转化,即互构共变。各种原生文化的差异性、具体性、多样性得到吸纳,其共同性、一般性、普遍性也得到升华,最终汇聚为一个新的复合型文化体^[21]。因之,社会互构共变,特别是互构谐变的思想,同样根植于传统思想文化,同样具有中国的文化禀赋。

实践结构论的中心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快速转型背景下,社会行动与社会生活发生的结构性巨变问题。尽管这一理论的着眼之处是“当下”的社会生活与社会行动,但是这个“当下”得以展开的前提——现代化、社会转型,在郑杭生的理论中都与“过去”、传统密切关联,因而实践结构论仍旧没有跳出传统的“掌心”,仍然笼罩着“过去”的“阴影”。这一点也可以从郑杭生有关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意义的说明中一见端倪。郑杭生指出,通过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发掘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概念和命题,把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经验理论化、概念化,进而形成理论原理或学说,不仅能够为当下社会生活提供来自历史文化传统的知识支持,而且可以进一步丰富发展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丰富完善社会学的知识体系^{[20](P4)}。就此而言,实践结构论同样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有着不解之缘,具有来自中国文化的独特禀赋。

学科本土论的“本土化”取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传统社会思想文化的有益元素纳入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当中,从而使其具备中国的文化禀赋。郑杭生指出,社会学的中国化首先是立足现实,同时也与弘扬传统分不开。而所谓弘扬传统,就是中国社会学注意吸纳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丰富的社会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治乱盛衰的思想,以此来观察现实的中国社会,并对西方传入的社会学给以带有中国特色的解释^[22]。开发传统,并不仅

仅满足于应用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去分析打量过去曾经发生的、被资料文献纪录而有幸留存至今的那些事实,而且要将由此呈现出来的过往事实所蕴含的情与理,融入既有的理论视角中,生成诠释当下的新理论。郑杭生近年来大力倡导的“理论自觉”,就是对学科本土论——即社会学中国化——的进一步深化与升华,其主要表现之一是对传统资源作出自己的理论开发,结合中国社会的悠久历史文化和丰富学术资源,进行原创性的或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创新。

总而言之,郑杭生的“五论”无不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无不具备独特的中国文化禀赋,而这一文化特质都可以在“理论自觉”那里得到积极回应。因此,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的文化禀赋,不在于将传统社会思想文化收编帐下当作资料 and 对象,而在于将那些仍旧对现代、对当下产生深远影响的过去之情和理,化为自身的有机构成。故而,社会学的社会思想文化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分析、解释记录在案的历史文化事实,而更为重要的是要将历史文化事实所蕴含的情理、智慧转化为当下的理论元素。

五

世纪之初,费孝通先生在推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又曾大力提倡“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要求将传统社会思想与历史文化中那些在现代社会仍旧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观念、意识、价值等,纳入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之中,使中国社会学达成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3]。费孝通先生拓展社会学界限的实质,就是要求中国社会学应注重对“人”的研究,要在其社会学研究中融入那些在现代社会仍有顽强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元素,从而有效提升中国社会学的认识能力。

而以社会运行论为主干的郑杭生的社会学研究体系,正是在综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立足中国本土社会现实,融入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文化的有益元素,进而由此生成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因此,郑杭生的社会学研究由于其历史厚度^[24],达到了其应有的现实高度。从这一点来看,郑杭生的社会学研究在熔铸传统社会思想、锻造中国文化禀赋方面,恰与费孝通先生“拓展社会学界限”的理念遥相呼应。而且从郑杭生的“五论”的演进轨迹可以发现,郑杭生的社会学理论在建构之初,就明确表现出开发

传统的学术自觉,在时间上甚至要比费孝通先生的倡导要提前许多。

概而言之,郑杭生的“五论”在社会学的中国化实践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特别是其深厚的文化禀赋,使作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社会运行论之中国特色落在了实处。因此,郑杭生的社会学理论是世界眼光与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郑杭生先生被视为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的里程碑式人物之一,也是名实相符、当之无愧的^[25]。

[参考文献]

- [1] 郑杭生,等.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 [2] 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3] 郑杭生.中国社会大转型[J].中国软科学,1994,(1).
- [4] 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对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审视和快速转型期经验现实的反思[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4).
- [5] 徐晓军.社会互构论:超越经典二元对立社会学方法论的新探索[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2,(5).
- [6] 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若干新趋势——一种社会学分析的新视角[J].社会科学,2006,(10).
- [7] 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一种社会学分析的新视角[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6).
- [8] 郑杭生.社会学本土化及其在中国的表现——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探索的梳理和回顾之三[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1).
- [9] 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10] 谢立中.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努力与不足[J].河北学刊,2006,(5).

- [11] 谢立中.社会运行学派:理解与评论[A].“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现状、未来”研讨会论文集[C],2005.
- [12] 李迎生.当代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开拓者——郑杭生社会学探索历程[J].社会科学战线,2007,(1).
- [13] 郑杭生,童潇.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之路——在建国六十周年之际访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J].甘肃社会科学,2009,(5).
- [14] 杨敏.社会学的时代感、实践感与全球视野——郑杭生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兴起[J].甘肃社会科学,2006,(3).
- [15] 郑杭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N].光明日报,1985-07-29.
- [16] 郑杭生.社会运行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探索的梳理和回顾之一[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4).
- [17] 黄克武.谈晚清社会学翻译中的思想分途——严复、梁启超与章太炎所译社会学之研究[N].文汇报,2011-08-22.
- [18] 斯宾塞.群学肄言[M].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19] 郑杭生.论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被发明[J].天津社会科学,2008,(3).
- [20] 郑杭生,江立华,等.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21] 杨敏.瞭望文明:在共同生活中收获智慧构筑安全——关于比较文明研究的一种社会学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12,(2).
- [22] 郑杭生.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J].东南学术,1999,(5).
- [23]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J].北京大学学报,2003,(3).
- [24] 董驹翔,董翔薇.学术的历史感——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厚度[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3,(4).
- [25] 龚长宇.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的里程碑式人物[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2).

[责任编辑:陈梅云]